政局變動與政治抉擇：以宋元之際東南地區三支地方軍的遭遇爲例

黃寬重*

摘　要

南宋政權締造後，爲了防範北方強敵女眞及蒙古的侵犯，在江、淮、四川地區駐防重兵。相對的，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及湖南等非邊防要地，則守備顯得薄弱，而這五路又屬茶、鹽產銷及民族關係複雜的地區，由於社會經濟及民族矛盾，容易釀成衝突，爆發變亂。變亂分子對環境的熟悉，易於發揮游擊作戰的優勢，每使正規軍陷入苦戰。

宋廷爲了避免地區的變亂，影響社會治安及財政收入，乃利用地方武力，組成地方軍隊，先後在廣東成立摧鋒軍、福建成立左翼軍、湖南成立飛虎軍，藉以維護地方治安，發揮因時因地制宜的機動性。

這些地方軍成立時，在宋廷的規劃下，建立了二元的指揮系統。在宋廷的指揮調度下，既能發揮機動的作戰能力，又可避免軍隊私人化及地區化的危險，這是南宋朝廷在因應內外衝擊下，對北宋以來一直奉行的強幹弱枝的政策，所進行的局部修正。在這種體制運作下，三種地方軍在境內平亂或境外禦侮都曾締造卓越的戰果，對維護東南地區的安定及延長宋祚均有積極的貢獻。

到南宋晚期，宋蒙衝突以來，政局變動激烈，這三支地方軍在不同情境、不同領導下，對應付環境的變遷各有不同的選擇，造成不同的結果。這一遭遇，對我們瞭解宋元戰爭乃至政權交替之際，地方勢力的走向極有助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益，而其背景及結果如何，則是本論文擬進一步討論的。

一、前　言

南宋朝廷長期在女眞、蒙古等強敵的侵凌下，爲了維護政權，強化邊防戰力，將精銳的軍隊屯駐在江、淮之間及四川地區。相對的，境內非邊防地區的守備力量，則顯得相當薄弱，常常形成治安上的死角。

福建、廣東、廣西、江西和湖南等五路，不是南宋邊防要地，但山嶺起伏，地形崎嶇，民族關係複雜。此外，這五路又屬茶、鹽產銷要地，宋廷爲增加財源，實施茶鹽專賣，使茶鹽的產價與銷價差異極大，容易發生走私貿易。朝廷爲維護公賣利益，以公權力加以鎭壓時，每易釀成衝突，爆發變亂。變亂分子，熟知嶺南地區險峻的地形，掌握主動的優勢，易於發揮游擊作戰的機動性，這對以防禦女眞、蒙古爲主的江淮屯駐大軍而言，自難發揮戰力，遂使變亂相繼不絕，形成南宋建立以後，內政上極大的難題。

宋廷面對東南地區，變亂紛陳與盜賊據守險要的現象，爲了防制地區性的變亂發生乃至擴大，以免影響財政收入及危害社會秩序，乃謀利用當地民間自衛武力，組成軍隊，藉以在平時維護地方治安，一旦變亂爆發，則可以讓他們發揮因時、因地制宜的機動戰力，以彌補正規軍長途跋涉及無法適應特殊地區作戰的缺失，成爲維護東南地區治安的主要力量。

從紹興五年（1135）起，宋廷面對東南地區的特殊情況，相繼在廣東組成摧鋒軍，在福建成立左翼軍，淳熙七年（1180），辛棄疾也在湖南創置了飛虎軍。這三支地方軍，都是在地方官的推動下，以當地百姓爲主所組成的軍隊，而且透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雙重指揮、領導的方式，進行運作。此一作法，是南宋對行之久遠的強幹弱枝的政策，所做的修正，既避免了軍隊私人化或地域化，使中央難以控制的危險，又可發揮積極、機動、主動的戰鬥力。在二元指揮體系的運作下，這三支地方軍不論在境內平亂或境外禦侮，都曾締造卓越的戰果，對維護東南地區的安定及延長宋祚均有積極的貢獻。是南宋政權能夠持久的一個因素。

不過，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些地方軍的處境，也有著許多變化。一方面，宋廷對這些地方軍，透過不同的運作方式，改變、調整其編制，或調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資料庫

動其駐地，而改變了這些軍隊的體制，強化中央的權威性。另一方面由於地區性的變亂不斷，甚或擴大，中央控制力減弱，反而增強了地方勢力在地方軍的影響力，彰顯了地方的性格。隨著南宋內外政局的變動，地方勢力與朝廷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變化。這種現象，對了解南宋政局變化與地方武力的最後發展，都有很大的幫助。

南宋晚期，宋朝國祚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外來挑戰。理宗時期，宋、蒙二國在經歷過聯合滅金之後，很快的就因宋廷興兵入洛、收復三京的軍事行動，而以兵戎相見。不過，在初期，由於蒙古未傾力南侵，及南宋強化防禦佈署，使戰事暫時呈現膠著。然而，隨著蒙古內部趨於穩定，南向統一的企圖加強，侵宋的行動轉而增強。這一來，使南宋朝廷必須全力動員，面對挑釁。於是，正規的屯駐大軍、地方軍乃至自衛武力，都相繼投入戰鬥中。隨著情勢的變化，宋蒙遞嬗越趨明顯，捲入這場存亡絕續戰爭的地方軍，在最後階段的遭遇及其命運，對了解趙宋政權與地方武力的發展，有極大的意義。

本文是筆者研究南宋地方武力發展的一部分。作者想透過南宋抗蒙，及宋與蒙元政權遞嬗交替的最後四十年中，東南地區三支地方軍：摧鋒軍、左翼軍和飛虎軍，在不同情境、領導之下，面對不同環境的挑戰與衝擊，所做的選擇、造成不同的結果及最後走向爲例，說明地方武力在政權交替之際，所面臨的困境及其抉擇。筆者曾對這三支軍隊進行個案研究①。本文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對這三支地方軍只做簡單的介紹，旨在突顯地方軍的異同及宋廷的政策而已，主要則在透過政局變化，以說明這三支軍隊的最後命運。全文倉促成稿，疏漏必多，敬請指教。

二、摧鋒軍、左翼軍、飛虎軍的創置及其性質

摧鋒軍是由河東人韓京在紹興（1135）所創立的。初期隸於張浚爲推動

① 詳見 黃寬重，〈南宋飛虎軍：從地方軍到調駐軍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7 本 1 分，頁 123-146，1986．3，台灣台北。〈廣東摧鋒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65 本 4 分，頁 957－988，1994．12。〈福建左翼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68 本 2 分，頁 369-415，台灣台北。

北伐所成立的都督府中。紹興七年（1137）九月，張浚因酈瓊兵變被罷，宋廷裁撤都督府，將摧鋒軍改隸於殿前司。摧鋒軍維護廣東治安，成效頗著，因此曾任知廣州的薛弼，改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之後，目睹福建盜賊不絕，各地自衛武力的戰鬥力雖強，但力量分散，中央殿前司派駐福建地區的屯駐大軍則不受福建安撫使的節制，形成中央與地方各自爲政，不相統屬、不能合作的現象，乃建議仿效韓京在廣東的作法，組織閩贛地區的自衛武力。經過三年的努力，到紹興十八年（1148）閏八月，宋廷正式任命以虔州土豪陳敏所領的奇兵四百，以及汀漳派戍福建的士兵，組成左翼軍，隸於殿前司，由陳敏出任左翼軍統制官。

飛虎軍則由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辛棄疾在長沙所創。辛棄疾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帝完顏亮舉兵侵宋時，聚衆二千，謀圖恢復。次年奉表南歸，成爲著名的歸正人。他於淳熙六年（1179）三月任湖南轉運副使以後，瞭解湖南是南宋鎮撫西南邊區的要地，也是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接觸的地區，民族衝突頻仍，變亂相繼。孝宗乾道末年，宋廷駐守荆南的正規軍雖達二萬人，由於防區過於遼闊，備多力分，加以紀律腐敗，作戰力不振，因此，每逢亂事發生，總要求助於鄰近諸路的軍隊，才能平亂。像李接與賴文政之亂，即得力於廣東摧鋒軍協助勘亂②。甚至連平時的戍守，也有求助於鄰路的情況，顯示湖南守備相當虛弱。不過，調動外地軍隊「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③。因此，辛棄疾接替王佐出任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後，即於淳熙七年（1180）夏天，仿廣東摧鋒軍與左翼軍之例，籌設湖南地方軍隊。八月十八日，正式奉旨以「湖南飛虎軍」爲名，在名義上隸屬於步軍司。

這三支軍隊就編制額度而言，都稱不上是大的部隊，摧鋒軍初建時，有兵三千及馬數百匹，最多時約有六、七千人④。左翼軍初創時約有四千人，

② 向祥海：〈南宋李金與陳峒起義初探〉，《中國農民戰爭史論》第四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1版，頁417－424。又見朱瑞熙：〈南宋廣西李接起義〉，《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二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1版，頁282－283。 賴文政之亂，見黃寬重：〈南宋茶商賴文政之亂〉，《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日本同朋舍，1989年9月初版，頁133－140。

③ 《宋史》卷401〈辛棄疾傳〉，頁12163。

④ 黃寬重：〈廣東摧鋒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本4分，1994年12月，頁967。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般約維持五千兵力左右⑤。飛虎軍創置時以一千五百名爲額，最多時亦不超出三千五百名⑥。軍隊的成員，以當地土著（地方武力）爲主，但亦雜以其他調派的軍隊。如飛虎軍成立之初，主要成員是以潭州爲主的湖南百姓，後來補充的新兵也多是「本路（湖南）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甚至與潭州人結婚，視潭州爲家鄉的情形⑦。主要成員既是湖南人，地方軍的色彩相當強烈。相對的，摧鋒軍與左翼軍的成員來源就較爲複雜。摧鋒軍最初是以南下的勤王之師爲主，成立後，收編降賊及招募土人反而成爲主力⑧。左翼軍成立之初，除由陳敏領導私人武力——奇兵外，包括汀州、漳州等調派到福州的軍隊，後來又招刺一批吐渾軍。顯示摧鋒軍與左翼軍的成員比較複雜，不過當地人的比例顯然較高。

除軍隊成員以當地人爲主外，維持軍隊所需的費用，也是由駐在地的長官負責。辛棄疾創置飛虎軍時，除了兵、馬、裝備以外，還設立了營田莊、房賃、租地錢、營運錢，乃至安葬士兵及家眷的漏澤園⑨，他替飛虎軍未來發展作了長期性、整體性的籌劃。但這些費用極爲龐大，除了軍隊經常費由步軍司的闕額錢糧支用外，辛棄疾是將潭州的酒，由抽稅改爲專賣，以所增加的收入充當飛虎軍的財源之一⑩。摧鋒軍的財務則由轉運司應辦，每年由各駐地分上下半年，派人到轉運司搬請，而這一筆經費，是由鹽稅、市舶司抱認墟市錢、提舉司添助大兵錢、義兵錢、挪移總所綱銀、百姓捐輸的丁米錢及客丁錢等來支應的⑪。左翼軍成立之初，是由轉運司負責籌措經費

---

⑤ 黃寬重：〈福建左翼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本2分，頁382-383。

⑥ 黃寬重：〈南宋飛虎軍：從地方軍到調駐軍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本1分，1986年3月，頁129。

⑦ 眞德秀：《眞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九〈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戍壽昌狀〉，頁180。

⑧ 黃寬重：〈廣東摧鋒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頁970。

⑨ 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明永樂十四年內府刊本），卷185，頁7下，學生書局影印，民53年12月。

⑩ 眞德秀：前引書，卷9〈潭州奏復稅酒糧〉，頁175。

⑪ 見收入吳泳：《鶴林集》（四庫全書本）卷22〈奏寬民五事狀〉，頁5下；此文是晚宋史料，不知撰人，被誤收入吳泳文集中。又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154，頁1364上。

⑫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海出版社影印，廣雅叢書本），卷154，紹興15年9月壬申條，頁10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⑫。正式成立後，則改由駐在地的州縣負擔。左翼軍總部移駐泉州後，所有軍需用品、錢糧，都由泉州通判負責供應。顯示左翼軍總部所需糧餉、費用是由駐屯地區負責的⑬。至於這三支軍隊派駐到其他路或州縣，其所需經費，則由派駐地的地方政府支應⑭。

總之，從軍隊的成員以至軍費的支應情況看來，這三支地方軍在性質上，有較其他正規軍更爲強烈的地方色彩。

不過，從軍政指揮體系及軍隊組織調度的情況看來，也有強化中央權威的跡象。摧鋒軍創置之初，在體制上先隸屬於張浚爲推動北伐所建的都督府，後來改隸於殿前司，成爲中央正規軍的一支。宋廷並藉著調動統制、統領等重要領導者的方式，來強化中央的權威。然而，摧鋒軍的主要戍地和扮演的角色都在廣東，它的統制官也兼知循州或廣東兵馬鈐轄的身分，實際上是受廣東安撫使的節制⑮。從現存宋代廣東地方志如《潮州府志》，在敍述營寨時，將摧鋒軍獨立於禁兵、廂兵、鋪兵、土兵等四個系統之外⑯，這和南宋屯駐大兵不受地方帥司節制的現象，有所不同⑰。

這種二元指揮體系，到左翼軍成立時更爲清楚。左翼軍是由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薛弼倡議的，因此在體制上，一方面隸屬於殿前司，官員由中央政府調派，但實際上除財務由地方政府籌措支應外，更接受福建安撫使的節度，明顯的呈現雙重的指揮現象⑱。初期左翼軍駐在福州，兼受安撫使節制是當然的。但後來，左翼軍移駐泉州，宋廷仍不讓它受知泉州的節制，可見州縣長官並無節制調度左翼軍之權。一直到淳熙二年（1175）知泉州趙必愿奏請節制左翼軍時，宋廷改爲「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⑲，此後每逢福建地區有叛變，泉州的左翼軍才直接聽命安撫使。然而知泉州仍無權指揮左翼軍統制，同時左翼軍招募與揀汰士兵，仍須遵照三衙及御前諸軍的規定，顯示宋廷掌控地方軍隊事務的企圖，仍然強烈。

---

⑬ 眞德秀：前引書，卷8，頁165上。
⑭ 《泉州府志》卷24，頁28下。
⑮ 參見梁天錫：〈南宋廣東摧鋒軍〉，收入林天蔚主編：《嶺南文化新探論文集》，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出版，1996年初版，頁166。
⑯ 《永樂大典》（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卷5343，頁16上。
⑰ 薛季宣：《浪語集》（四庫全書本）卷33〈箋先大夫行狀〉，頁33上。
⑱ 黃寬重：〈福建左翼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頁384－385。
⑲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56年1月初版）卷54，頁1上。

飛虎軍全由辛棄疾一手推動、籌劃，因此宋廷規定這支軍隊「遙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⑳，顯是比照淳熙二年（1175）左翼軍的政策。然而，辛棄疾卸任後，繼任者難以承擔龐大的軍費，加以該軍勇悍善戰，屯駐荊、鄂的正規軍統制，極力爭取撥調，到淳熙十年（1183）五月，宋廷將飛虎軍改隸御前江陵軍額㉑。雖然廷臣對此意見不一，有所討論，但到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孝宗正式同意荊鄂都統司對飛虎軍有指揮、調度的權力㉒。此後飛虎軍成了隨令調派的調駐軍，地方軍的色彩轉淡。

宋廷在名分與行政的隸屬關係上，對地方軍具有實質的意義，因此，伴隨而來的是中央無所不在的指揮、調度權；從軍官的調派、軍隊的調度、乃至軍隊成員的添補，都展現中央政府的權威性。

廣東摧鋒軍是韓京一手創立的地方軍，在維護廣東治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軍隊成員與韓京長期的依存關係，不免形成軍隊私人化的現象，因此宋廷在解除大將兵權之後，便將矛頭指向韓京。紹興十九年（1149），在新任知廣州、廣東安撫使薛弼的主導下，以張寧替代韓京㉓。張寧隨即著手改變摧鋒軍的體制，強化中央的影響力。張寧之後，繼任摧鋒軍統制的是殿前司正將郭振㉔，他們二人都由宋廷直接派任的。陳敏雖然創立左翼軍，不過到紹興二十九年（1159）四月，宋廷就改調他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所率的二千名左翼軍也跟著改隸破敵軍㉕。其後繼任左翼軍統制者亦由宋廷任命。飛虎軍成立之初，除了少數軍官由宋廷任命外，其餘幹部是由飛虎軍中推選武藝高強，爲衆所信服的人爲教頭、押隊等官㉖。這顯示宋廷面對湖南地區頻仍的變亂，所做的權宜措施。不過，這種情況只維持短暫的時間。等到飛虎軍改隸荊鄂都統制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從筆者所蒐集到飛虎軍將官名單中，有八名是由朝廷或潭州以外地區調派的，其中七名是在戰爭前，臨

⑳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文海出版社影印適園叢書本）卷 18〈湖南飛虎軍〉，頁 17 上。
㉑ 《宋史》卷 35〈孝宗本紀〉，頁 680。
㉒ 周必大：《文忠集》（四庫全書本）卷 146〈奏詔錄一〉，頁 8 下。
㉓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9，紹興十九年六月甲寅條，頁 11 下－12 上。
㉔ 《要錄》卷 185，紹興三十年四月丁卯條，頁 3 上。
㉕ 《要錄》卷 181，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庚寅條，頁 12 下。
㉖ 周必大：前引書，卷 143〈奏議十〉「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頁 11 下。

臺灣博碩士論文期刊資料庫

時調派領導飛虎軍作戰的，顯示宋廷強化中央權威的一面㉗。

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軍隊調動與駐屯上。摧鋒軍在嶺南的駐地就有很大的變化；初期旨在維護廣東治安，後來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盜亂不斷，摧鋒軍受命剿亂之餘，也擴大它的屯駐地區，根據淳熙初廣東提刑林光朝向宋廷的奏疏中，提到摧鋒軍駐地有二十四個㉘，淳熙末，蔡戡的奏章中提到的駐地有二十一處㉙，而李心傳指出嘉泰二年（1202）摧鋒軍在廣東屯駐地有二十處，調戍境外的地方包括福建路、湖北路、廣西路、江東路、江西路、四川路等六路㉚。更相繼被調派參與平定齊述、賴文政、陳峒、李接、大奚山、黑風峒等十餘次的亂事及抗金等戰役㉛。

左翼軍成立時，陳敏相度福建各地的重要性，擇定十三處作爲分戍之地㉜，其中包括福州、泉州、建州、汀州、漳州。後來，左翼軍除部分奉派改隸破敵軍外，也被調參與禦侮的任務，包括高、孝之際抗金及開禧北伐，還與其他軍隊合力敉平內亂，像沈師之亂、黑風峒之亂、溫州海寇、晏夢彪之亂、唐石山寇亂、陳三槍之亂等㉝。飛虎軍改隸荆鄂都統司後，因隸屬關係的轉變，及駐防區的擴大，加以屯駐大兵的腐敗，於是，逐漸取代正規軍，成爲負起防衛疆土、穩定長江中游的力量，曹彥約就說「荆鄂之大軍，不如長沙之飛虎，襄陽之副司，不得如江陵之神勁」㉞，這支軍隊先後被調派參與開禧北伐、黑風峒之亂、黎州蠻之亂、信陽、光州抗金、廣西抗蒙等八次戰役㉟。這三支地方軍屯駐地的擴大，以及參與境內外平亂禦侮的任務，固然顯示這些軍隊戰鬥力強大，同時也顯現宋廷爲防止地方勢力凝聚、擴大，形成尾大不掉的現象，而要藉著擴大駐地、外調等方式，來強化中央

㉗ 黃寬重：〈南宋飛虎軍：從地方軍到調駐軍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7本1分，頁128-129，1986．3。

㉘ 《歷代名臣奏議》卷224，頁15上。

㉙ 蔡戡：《定齋集》（四庫全書本）卷1，頁13下。

㉚ 梁天錫：前引文，前引書，頁168－169。

㉛ 黃寬重：〈廣東摧鋒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65本4分，頁976－982，1994．12。 梁天錫：前引文，前引書，頁171－173。

㉜ 《宋史》卷402〈陳敏傳〉，頁12181。

㉝ 黃寬重：〈福建左翼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頁394－398。

㉞ 《歷代名臣奏議》卷224，頁28下。

㉟ 黃寬重：〈南宋飛虎軍：從地方軍到調駐軍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7本1分，頁130－135，1986．3。

臺灣大學博碩期刊資料庫

的權威。

從摧鋒軍、左翼軍及飛虎軍的創置及組織建制的變化，充分反映南宋朝廷爲適應特殊環境的需求，因應新的變化，在原有禁、廂、鄉、蕃等正規軍事體制之外，另外成立一支介於中央軍與民間自衛武力之間的軍隊——地方軍，來維護地方治安，鞏固政權。並以二元指揮體系，呈現地方勢力與中央權威並存、相互制衡的現象，是南宋政府面對內外政局變化後，對北宋以來行之久遠的強幹弱枝政策，所做的修正。這是地方軍的共通特性，也是南宋政權能持久的有利因素。

三、中央權威與地方勢力的消長

宋廷既要倚賴地方軍隊來維護東南地區的治安，在人員裝備、訓練方面都有別於中央正規軍，財政上也對地方多所依賴，呈現比較濃厚的地方色彩。但若任由此一情勢發展、擴大，則將影響中央權威。經權衡利弊，嘗試調整後，逐漸發展出二元指揮的體系，即這些地方軍在體制上隸屬於中央的三衙，各路安撫使則有節制調度之權，並藉軍官派任、軍隊調駐、人員補充等方式，來貫徹中央的作爲，避免形成地方勢力過度膨脹，中央難以控制的局面。然而，宋廷對地方軍既利用又控制，而且要發揮正面的效果，並非易事，同時這一種平衡狀況能否有效維持，與政局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摧鋒軍、左翼軍與飛虎軍的成立，固然與東南地區亂事有關，但這三支地方軍是在趙宋政權重建，中央權威可以有效伸張的時候創置的。摧鋒軍與左翼軍成立時，宋廷對地方武力與擁兵大將，尚有顧忌，因此透過二元指揮體系的建立來控制地方軍，藉王朝的權威來調動將領、調派軍隊。像韓京領導摧鋒軍長達十餘年，但在秦檜的安排下，更易他的領導權毫無困難。陳敏與左翼軍的關係也有十餘年，宋廷同樣輕易的調動他和左翼軍遠離福建，出任新職。飛虎軍成立於湖南變亂相繼，防禦淮邊的屯駐大軍無法發揮戰力的時候，由朝廷命官辛棄疾籌措財源、組織地方民兵，替朝廷維護地區性的治安，因此給予湖南安撫使較大的權限，飛虎軍只「遙隸步軍司」。這時孝宗當政，有能力掌控整個政局，給予地方政府較大權力也是中央威信的展示。我們可以從宋廷輕易調動地方軍的統制，調派地方軍在境內或出境敉平盜

亂，甚至北上抗金，看出宋廷展現中央權威的積極作法。

韓侂胄所發動的開禧北伐，是宋廷展現中央權威的重要時刻，也是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的關鍵。孝宗是南宋的盛世，光宗一朝無所作爲，朝政衰象逐漸呈現。寧宗繼位之後，趙汝愚與韓侂胄爭權，引發慶元黨禁。韓侂胄在沒有預先做好規劃與準備的情況下，冒然發動北伐的軍事行動。這時戍守淮邊的正規軍趨於頹靡，乃動員地方軍如湖北神勁軍、湖南飛虎軍及福建左翼軍，甚至左翼水軍的戰艦，參與北伐。由於臨時派將調度指揮，兵將並不熟識，難以發揮戰力，衛涇對飛虎軍參與北伐致敗的原因，有深刻的評論，他說：「開禧用兵，蓋嘗調發，緣統御無術，分隸失宜，兵將素不相諳，枉致刦卹，人皆惜之。」[36] 左翼軍的遭遇更爲悲慘，它在北伐或守衛揚州時，犧牲慘重，最後竟致「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37]。

開禧北伐的結果，不僅宋金關係重新調整，對這三支地方軍而言，也有很大的轉變。飛虎軍取代襄鄂的屯駐大軍，成爲此後宋朝防禦長江中游的重要戰力之一。左翼軍的受創甚重，此後已非對付福建等地變亂的主力，而要仰賴淮西的正規軍，才能平亂。從朝廷對左翼軍指揮權的下移，及摧鋒軍叛亂的過程，顯示中央威權的喪失及地方性格的逐漸浮現。

左翼軍的指揮體系，一向是由中央的殿前司及福建安撫使雙線領導，左翼軍原駐福州，這樣的指揮體系當無問題。到左翼軍總部移駐泉州後，問題便浮現出來，泉州的通判負責籌措左翼軍的經費，但知泉州卻不能預聞左翼軍的事務，左翼軍統制與知泉州不相統屬，互成敵體，造成許多困擾[38]。此一現象，在嘉定十一年（1218），眞德秀知泉州後，不斷向宋廷提出反應，要求讓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39]。宋廷先前只允許「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而已[40]，經他一再申狀爭取，到嘉定十四年（1221）宋廷終於答應「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41]。此外黑風峒變亂時，宋廷也命知汀

㊱ 《歷代名臣奏議》卷185，頁6下。
㊲ 眞德秀：前引書，卷8，頁159上。
㊳ 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88，頁165下，汪大猷知泉州之例。
㊴ 眞德秀：前引書，卷8，頁165上下。
㊵ 眞德秀：前引書，卷9，頁168下。
㊶ 眞德秀：前引書，卷9，頁170。又《宋史全文》（四庫全書本）卷30，頁66上。

臺灣期刊論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州鄰非熊節制屯戍本州的左翼軍[42]。

雖然從以後的發展看來，眞德秀要求知泉州節制左翼軍，以強化地方長官對軍隊的掌控能力，期能發揮平亂禦侮的效果並未達成，反而讓地方勢力與地方官吏的利益，更爲緊密的結合起來。況且泉州通判負責籌措左翼軍的經費，使兩者有著較強的依存關係。左翼軍所代表的地方勢力與地方官吏之間，既有著經濟上的依存關係，又有行政上的隸屬關係。到南宋晚期，朝廷爲了救亡圖存，對地方長官的任命不再遵守慣有的避籍制度，泉州士人可以出任知泉州，遂使泉州的地方勢力與經濟利益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展現強烈的地方性格，一旦外在情勢有所變化，就很容易影響左翼軍的走向。

摧鋒軍的叛亂過程，顯示地方對中央的抗拒，是地方性格強化的表徵。摧鋒軍雖然沒有參與開禧北伐，降低了它的折損率，但一連串的出征作戰，及更戍防邊，使士卒疲於奔命，部隊的財務也不如正規軍的穩定，這些因素都足以影響部隊乃至官兵的權益，容易因小事而釀成禍端。理宗初年，淮海地區變亂頻仍，駐防該地的宋軍都無法正常更戍，其中駐守建康的一支摧鋒軍，駐期已達四年，本應回駐廣東。不久，江西發生陳三槍變亂，亂區不斷擴大，這支摧鋒軍又受命調赴江西平亂。亂平之賞卻不及，請求撤戍回粵，又不報，摧鋒士卒因憤成釁，由曾忠所率的部分士卒在回途中，密謀爲亂，攻下博羅縣城，殺縣令，直趨廣州，郡守宵遁，人心憂危，提舉常平黃崈，推舉鄉人崔與之主持郡務。曾忠等率兵遁去，入據肇慶府。後轉據廣東、廣西與湖南三路交界的險阻處，據險抗命。崔與之調集各地摧鋒軍、勇敢軍、湖南飛虎軍、江西諸路兵馬及水軍，水陸會合，費時四個月，才平定亂事[43]。這個事例，顯示到南宋晚期，由於軍政不肅，使地方軍在長期徵調不得回鄉，及獎賞不明的情況下，發動武裝叛亂，是對朝廷處置不公的抗議，也是地方性格的展現。擔負平亂任務的也是由地方士紳崔與之督導摧鋒軍、飛虎軍及各地方武力來完成的。反之，屯駐大軍的戰力則難以發揮，可見宋廷的威望在減弱中，中央權威與地方勢力的消長充分顯現出來。

---

[42] 《永樂大典》卷 7892，頁 28 上。

[43] 《宋史》卷 406〈崔與之傳〉，頁 12262。又《崔清獻公全錄》卷 2，頁 10 下－11 上；卷 3，頁 5 上、下，頁 12 上、下，頁 15 下。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政局變動下地方軍的遭遇與抉擇

從宋理宗親政起，宋蒙關係明顯轉變，趙宋朝廷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端平元年（1234）宋蒙兩國在經歷聯合滅金、短暫和好相處之後，很快的就因爲理宗與宰相趙清之，支持趙葵、趙范兄弟收復三京的建議，派兵進取洛陽，破壞盟約[44]，雙方遂以兵戎相見。次年（1235），爲了報復宋朝的「入洛」之師，蒙古太宗發動了一連串攻宋計劃。此後宋蒙兵連禍結，宋東南三支地方軍也相繼加入這場戰爭中。

首先加入宋蒙戰爭的是摧鋒軍。端平二年（1235）秋天，蒙古皇子闊端率兵分路南向，其中一路自鞏昌侵入宋境，攻大安軍，宋利州都統曹友聞派摧鋒軍統制王資和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防守雞冠隘。蒙軍數萬攻隘，王、白二將由隘內與援兵形成裏外夾擊之勢，逼退蒙古軍。王資與摧鋒軍均因功受賞。次年秋（1236），闊端親率兵攻大散關，佔興元、大安軍，宋蒙二軍，在雞冠隘與陽平關，再度發生激戰，最後曹友聞戰死，摧鋒軍與其他忠義軍，幾乎全軍覆沒[45]。

蒙古太宗以後，蒙古內部問題叢生，無力攻宋，宋也強化邊防戰力，因此宋蒙之間雖有軍事衝突，但戰爭的規模不大。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1251）蒙哥汗封皇弟忽必烈治領漢地以後，蒙古才又注意到對南方的經營。次年，命忽必烈出兵大理。寶祐三年（1255，憲宗五年）大將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全境。五年春（1257），蒙哥正式「詔諸王出師征宋」[46]，次年，兵分三路攻宋。蒙哥汗親率主力攻四川，忽必烈攻鄂州，留在大理的兀良合台則由大理攻廣西，出潭州後與忽必烈會合，形成對宋三面包圍的形勢。面對蒙古軍三面而來的凌厲攻勢，宋廷動員了四川、長江中游及西南的兵力，全力抗蒙。

飛虎軍首先到廣西，參加了對抗兀良合台的部隊。兀良合台受命由西南

---

[44] 黃寬重：〈「端平入洛敗盟」辨〉，《史繹》10期，民國62年10月，頁54－64。

[45] 胡昭曦：《宋蒙關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08－109。李天鳴：《宋元戰史》（食貨出版社，民國79年）第二章，頁309－314。

[46] 《元史》卷3〈憲宗〉，頁50。

攻宋後，於寶祐五年十二月（1258年初），率兵千餘，先試探性的進攻安南與廣西。次年八月，由大理發兵，取道特磨道，攻入宋境，在田州、橫山寨一帶，與宋軍對峙。面對蒙古兵的斡腹之謀，宋朝開始積極加強西南邊防，先於寶祐五年（1257）五、六月間，任命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的李曾伯，抽調六千名的飛虎、武勝兩軍前往廣西駐防[47]。這是飛虎軍南調抗蒙的第一步。是年十一月起，宋廷調任李曾伯負責廣南防務，任命他爲廣南制置大使，兼知靜江府，治司靜江府[48]。李曾伯到任後爲了增強抗蒙戰力，積極修築城池、關隘，訓練民丁、團結溪洞，同時爭取安南的陳朝，使安南成爲宋朝在西南戰線上協助抵禦蒙古的重要力量。此外，還增加佈防軍隊，到處徵調精銳部隊，防衛宋朝的後門。廣西一路，宋廷一向疏於防範，寶祐五年（1257）徐敏子任廣西經略使時，只有一千八百名駐軍。印應飛接任經略使後，也不過六千二百人[49]，防衛力量十分脆弱。李曾伯上任後，除了先前調長沙六千名軍隊外，更陸續從江淮、荆湖及廣東調派軍隊，其中寶祐六年（1258）五月，廣西曾將所招到的九百二十名安邊軍與飛虎軍，整編成「安邊新軍」。最多時李曾伯曾徵調了二萬六千名正規軍到廣西佈防。飛虎軍參與抗蒙的約有三千五百人，比例上不及總數的七之一[50]。從人數上看，飛虎軍顯然不是抗蒙的主力，但是，從戰爭爆發後，當地的官吏建議徵調飛虎軍與役，以及調派湖南帥臣入桂領導抗蒙大計，可見在當時飛虎軍是一支相當被重視的部隊。

寶祐六年（1258），入侵廣西的蒙古軍多感染瘴氣，甚至患病而死，主帥兀良合台也因病[51]，被迫退回大理，廣西暫時解除危機。這一年，由大理北上的蒙古兵一度威脅到湖南，宋廷調向士璧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向氏爲了加強湖南的防衛戰力，欲由李曾伯手中調回飛虎軍，二人曾發生爭奪飛

---

47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集（四庫全書本）卷5〈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頁3上、下。
48 李曾伯；前引書 後集，卷5〈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頁29上。
49 李天鳴：前引書，頁702。
50 陳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後宋蒙陳三朝間的關係〉，收入鄧廣銘、程應鏐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初版，頁424。
51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集》卷9〈回庚宣諭奏〉，頁23上、下。又見《元史》卷121〈兀良哈台附傳〉，頁2981。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虎軍的統制權[52]。

理宗開慶元年（1259，憲宗九年），兀良合台爲配合蒙哥汗攻四川、忽必烈攻鄂州的軍事行動，再次進攻廣西。蒙古兵聯合先降服的西南各少數民族，一齊攻廣西[53]，破橫山寨，繞過靜江府，入全州，進兵湖南境內，於十一月十九日圍潭州城[54]，潭州危急。幸好由於蒙哥汗死於四川的消息南傳，忽必烈爲爭取汗位，決定班師，派人通知兀良合台，圍潭州的蒙軍乃向長江撤退[55]

飛虎軍在蒙古斡腹之謀的軍事行動中，被徵調到廣西抗敵，也曾引發湖南、廣西帥臣爭奪統制權。飛虎軍抗蒙實績，由於文獻不足，無法得其詳。不過，在這場戰役中，宋蒙兩軍，感染疾病而死者爲數頗多[56]，飛虎軍在投入戰爭的過程中，相信是有折將喪兵的情形，甚至可能難以成軍，以致到度宗時，湖南安撫使汪立信要另創「威敵軍」。飛虎軍可能被整編入「威敵軍」中。因此，南宋末年，沒有飛虎軍進一步的訊息[57]。

忽必烈即位後，調整對宋戰略，訓練水軍，全力攻襄陽，經五年包圍苦戰，迫使宋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透過呂文煥的招降，以及蒙軍全面南進，使風雨飄搖的南宋政權，面臨了存亡絕續的最後考驗。

由於宋朝政腐敗已極，加上呂文煥招降的效應浮現，因此元帥伯顏於咸淳十年（1274）六月，率兵南進後，宋沿江州縣先後降附。德祐二年（1276）一月，元軍兵臨臨安，宋廷上降表[58]，此後，除了兩浙、四川部分地區拒不投降，或激烈抗元，以及江東、江西、荆湖地區時有反覆之外，福建、兩廣是宋流亡政權建立的基地，成爲宋遺民抗元圖存的最後據點，當地的精銳部隊：左翼軍與摧鋒軍，更成了維繫趙宋國祚兩道最後防線。

當元兵包圍臨安時，謝太皇太后接受文天祥的建議，令趙昰和趙昺二王出鎮。兩王在朝臣護衛下，離開臨安，經婺州到溫州，與陸秀夫、陳宜中、

---

[52]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集》卷9〈以湘師申押回飛虎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二事〉，頁37上－39上。此事結果如何不得其詳。
[53]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傳〉，頁2981。
[54] 李天鳴：《宋元戰史》，頁767。
[55]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傳〉，頁2981。
[56] 李天鳴：《宋元戰史》，頁705－706。
[57] 《宋史》卷416〈汪立信傳〉，頁12474。
[58] 《宋史》卷47〈瀛國公〉，頁937－38。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張世傑等會合於福州[59]。德祐二年（1276）五月一日，朝臣正式擁益王趙昰在福州即皇帝位，是爲宋端宗，改年號爲景炎。十月，元軍分道進逼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二王登舟入海以避敵。這時宋有正規軍十七萬，民兵三十餘萬，內有淮兵精銳一萬，是抗元的重要戰力[60]。

元政權爲了殲滅殘餘的擁宋勢力，自景炎元年（1276）九月起，分六路向華南各地展開攻擊，其中有三路是以福建爲目標[61]。福建地區人心浮動。左翼軍分駐福建各要地，在元軍入侵的過程中，發揮了多少戰力，由於資料不足，並不清楚。不過，泉州是左翼軍的主力所在，當流亡政權抵達泉州後，左翼軍對它的支持與否，對泉州的政治動向與趙宋政權的存亡有重要影響。

宋君臣到泉州後，提舉市舶司蒲壽庚請求端宗駐蹕的提議，遭張世傑反對。由於流亡政權大隊人馬所需糧食及船舶不足，世傑派兵搶奪壽庚的船隻及糧食，引起壽庚的不滿，乃怒殺在泉州的宗室子、士夫夫及停留的淮兵。同年十二月八日，元軍抵泉州[62]，蒲壽庚與知州田眞子獻城投降[63]。

關於蒲壽庚舉泉州降元，對宋抗元勢力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乃至蒲壽庚個人身分等問題，長期以來引起學者熱烈討論。經過不斷的探索與辨析，使我們對整理事件的始末、蒲壽庚降元與左翼軍的關係，及左翼軍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64]，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蒲壽庚擔任泉州市舶司一職雖爲時不久，但由於他經營海舶甚久，在泉州已擁有相當的勢力，益王在福州組織流亡政權時，爲承認他在泉州的既成勢力，任命他爲招撫使。後來，蒲氏與擁有節制左翼軍權力的知泉州田眞子、左翼軍統領夏璟等泉州地方精英，在蒙軍南侵、宋室覆亡之際，不免以個人、家族及地方的利益爲依歸，與宗室派及抗元派爆發大衝突。由於他們控制當地的兵權，最後以剷除抗元、宗室這二股勢力而降元。可見蒲壽庚的

---

[59] 胡昭曦：《宋蒙關係史》，頁 427。
[60] 《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廣王本末〉，頁 66。
[61] 參見李天鳴，《宋元戰史》，頁 1390。
[62] 《宋史》卷 47，頁 942；《宋季三朝政要》卷 6，頁 66。
[63] 《宋史》卷 47，頁 942。
[64] 蘇基朗，〈論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的關係〉，收入《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民 80 年 11 月，商務印書館初版），頁 1-35。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期刊資料庫

降元，是得到包括左翼軍領導階層在內的泉州地方勢力及精英份子的支持。

這種情況，也可以從隨後在泉州爆發宋元雙方攻防戰中得到証明。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張世傑率淮軍及諸洞畬軍，回師包圍泉州。蒲壽庚與田眞子，是在林純子、顏伯錄、孫勝夫、尤永賢、王與、金泳等泉州地方精英的協助下，堅守九十日，並派人至杭州向元帥唆都求援[65]，加上蒲壽庚陰賂畬軍，畬軍未全力攻城，使唆都的援兵，得以順利解泉州之圍[66]。這一事實說明整個泉州的地方勢力，當宋元政權交替之際，政治態度並不猶豫。因此，元朝在至元十九年（1282）於泉州設置軍隊的建制時，除調揚州合必軍三千人鎭戍外，也成立泉州左副翼萬戶府，正是以宋殿前司左翼軍改隸，以及增刷當地土軍而成的[67]。

蒲壽庚與左翼軍等泉州地方勢力，在最後時刻曾“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對大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士大夫問題與左翼軍的關係較少，此不贅述。以下擬以左翼軍爲主，進一步討論地方勢力與宗室、淮兵二者的關係。

泉州在南宋海上交通的地位，逐步超越廣州，成爲當時重要的港埠[68]。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相當豐厚[69]，除解繳朝廷之外，亦負擔寄居郡中的宗室的供養費。從高宗起，宋廷在泉州置南外宗正司，供養宋太祖的子孫。南外的宗子人數在紹興元年（1131）有三百四十九人[70]，後來人口迅速增加，到南宋末年，已達三千人以上。南外宗室的供養費，宋廷規定由泉州及轉運司各負擔一半。紹定五年（1232）眞德秀爲減輕泉州的負擔，建議由朝廷、轉運司、泉州各負擔三分之一。朝廷負擔的部分，撥市舶司錢充付[71]。如此一來，宗子供養費成爲泉州與市舶司二者共負的重擔。加上宗人在地方挾勢爲暴，占役禁兵，破壞鹽法，胡作非爲，爲禍地方[72]，亦必與地方勢力相衝

---

65 蘇基朗，前引文，頁17-21。
66 《宋季三朝政要》卷6，頁68。
67 《乾隆泉州府志》卷24，元軍制，頁28下-29上。
68 參見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學生書局，民75年1月初版）第三章第一、二部，頁131-174。
69 李東華：前引書，頁189，他指出初期全國收入爲二百萬緡，泉州不低於三分之一。
70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9〈帝系十〉，頁2057。
71 眞德秀：前引書，卷15，頁258。
72 李東華，前引書，頁188。蘇基朗：前引書，頁22。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突。

宗室爲維持其優越的地位及自身的利益，勢必堅持擁護趙宋政權。然而，流亡政權已處於危亡之秋，擁宋抗元所帶來的後果，對地方勢力及擁有市舶之利的蒲氏家族，是很清楚的。在這種既有宿怨，又有新慮的情況下，地方勢力與宗室的衝突是不言可諭的。

從軍隊結構與作戰能力看，左翼軍與淮軍也是有矛盾的。左翼軍是以地方武力爲基礎，納入三衙的指揮體系，轉化成朝廷調控的軍隊，這是在舊有軍事體制之外，出現分隸於中央與地方，形成二元指揮體系的地方軍。由於左翼軍的作戰能力強，成爲維護地方治安，甚至被調派出境征討、防禦，但這一來卻逐漸削弱了它原來防衛福建的功能。後來，加入左翼軍的份子較雜、戰力也較弱，以至發生如前節所述，從嘉定後期起，福建地區爆發的若干較大規模的叛亂活動，多要仰賴原駐防兩淮，防守宋金邊境的屯駐大軍（即淮兵），才得以敉平亂事。

嘉定以後，左翼軍雖然仍是福建地區的重要軍隊，但它在維護地方治安的能力遠遜於往昔，宋廷乃藉調派的方式，讓淮軍將領透入左翼軍中。到景炎元年（1276），隨同流亡政權到泉州的萬餘淮兵，是元軍由淮渡江的爭戰過程中，不願歸順新朝，或在主帥領導下效忠宋室的勤王之師。從張世傑在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回師攻泉州城時，有淮軍參與[73]，及同月留在福州的淮兵，謀殺害降元的知福州王積翁，以接應張世傑的事實看來[74]，這批淮兵不僅是晚宋支撐政局的重要武力，也是對宋室忠誠度最高的部隊。這種情況，顯然與地方性格佔優勢、以維護地方利益爲前提的左翼軍，有很大的差異。這二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及政治利益的武力集團，共處泉州，衝突必不可免，當然要設法剷除的。

因此可以說，當宋元政權交替之際，在泉州的蒲壽庚與左翼軍爲主的地方勢力，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與抗元派士大夫、宗室以及淮兵，對新舊政權的認同有極大的差異，甚至發生衝突，遂使蒲壽庚等人須藉左翼軍的武力，剷除不同政治意見的集團，而投向新的蒙元王朝。

---

[73] 《宋季三朝政要》卷 6，頁 68。
[74] 《宋史》卷 47，頁 9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摧鋒軍也是維繫晚宋廣東安全的主要勢力，因此元帥阿里海牙部由湖南南下時，廣東各地的摧鋒軍，便成爲晚宋抗蒙最後力量之一。由於資料不全，本文無法對摧鋒軍在廣東各地抗蒙情況作完整的陳述[75]。謹彙輯資料較豐的廣州和潮州抗蒙的情形。

臨安陷落後，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見廣東危急，派了梁雄飛到隆興向元請降。元江西都元帥宋都帶即任命雄飛爲招討使，率兵先後攻破南雄、韶州等地，向廣州前進。宋流亡政權成立後，傳檄各地起兵抗元，徐直諒得訊，便派廣州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摧鋒軍將黃俊、陳實、水軍將領謝賢等至石門，阻止元軍進入廣州[76]。當時廣州兵力號稱二萬，然而「遙望虜騎，擁山塞州」，李性道大爲恐慌，懼不敢戰。及元軍排成陣勢進攻時，只有黃俊率所部摧鋒軍，奮勇迎戰，餘人均畏縮不援，終被元軍擊敗，逃回廣州城。徐直諒聞訊逃出廣州。元軍遂於德祐二年（1276）六月十三日進入廣州城。李性道、陳實、謝賢投降，黃俊不屈，被殺死於摧鋒軍寨的佛殿下[77]。

當元兵進入廣東時，江西都元帥也派宋降將梁雄飛到廣東各地招降。元軍入廣州，派熊飛駐守潮州、惠州一帶[78]。不久，熊飛與梁雄飛等人交惡。適宋流亡政府派制置使趙溍向廣東反攻，熊飛起而響應，改用宋旗幟，向廣州進攻。九月，趙溍等兵至廣州與熊飛兵會合，新會縣令曾逢龍率鄉兵亦至州城[79]，元軍棄城走。李性道出城迎熊飛與曾逢龍入城，不久，熊飛又收復韶州，元軍退守梅嶺。九月二十一日，趙溍入城，殺李性道及摧鋒軍將陳實、水軍將謝賢等。摧鋒軍協助收復廣州及附近地區，不僅支持兩廣的抗元活動，也爲此後流亡政府移至廣州奠下基礎。

景炎元年（1276），潮陽人馬發爲摧鋒寨正將，駐潮州，被州人推爲權知州事，號安撫使。二年（1277），元軍佔領廣州，宋循州、梅州守臣分別投降，馬發先率兵遁去，後又反正歸宋[80]。後來元兵暫時北調，宋人在文天

---

[75] 參見李天鳴：前引書，第七章，頁1373－1493。
[76] 《永樂大典》卷11905〈廣州府志〉，頁16上。
[77] 同上，頁16上；參見《宋史翼》。
[78] 《宋史·二王本紀》卷47，頁941。
[79] 《宋史翼》卷31〈曾逢龍傳〉。
[80] 《宋史·二王本紀》卷47，頁942；《永樂大典》卷5343，頁11下，但汪廷奎認爲馬發未降元，指《宋史·二王本紀》誤記。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祥、張世傑的號召下，再度重整旗鼓，謀復江山。十二月元軍再陷廣州，而於次年（1278）正月，回攻潮州。元將唆都指揮士兵，塡塞濠塹，建造雲梯、鵝車，日夜猛攻，馬發閉城堅守，並暗中派人燒燬元軍攻具，使元軍的攻勢頓挫。後來元兵改攻打城外營壘，以斷潮州外援。潮州拒守一月餘，有叛徒引元兵入東城，城陷。馬發收拾殘餘百餘人入子城拒守。至三月初，勢窮力盡，乃全家自殺[80]。馬發死守潮州是南宋廣東地區抗元最壯烈的事蹟之一，而摧鋒軍正是與他共患難、至死不降的最後支撐力量。

五、結　語

靖康之難後，趙宋君臣在江南重建政權，面對女眞兵的虎視，宋廷增強邊防戰力，同時，在東南地區成立了以維護地區治安爲主的地方軍。在君臣的努力下，終於渡過風雨飄搖的困境，締造中興機運。

宋廷爲了維護地區的社會秩序，招募土著，成立地方軍，以鎭壓反叛；爲了發揮靈活指揮、機動作戰的特性，對地方軍實施了二元指揮體系，即這些軍隊既隸屬於中央的三衙，又歸各路安撫使節制，經費雖由地方支付，中央則可以藉軍官任命、部隊調度等方式，發揮中央的權威性，這一體制設計與推動，則說明南宋朝廷爲因應新的挑戰，對舊有「強幹弱枝」政策進行了適切的修正，是南宋政權能維持統治的重要因素。

在二元指揮體系下，東南各地地方軍的運作方式，大同小異，各具特色。經費的籌措、成員的組成、訓練調度，以及軍官任命等均無差異。但在隸屬關係與軍隊的屬性上則有別，較早成立的摧鋒軍，二元指揮體系僅具雛形，到左翼軍創立時較爲明確，但在推動時，中央的權威性格仍顯露無遺。飛虎軍成立時，地方化的性質更強，然而，情勢的演變，卻使飛虎軍最早成爲中央調派的調駐軍，地方軍的性格減弱。寧宗以後，知泉州及其他州縣長官逐漸可以節制左翼軍，以及摧鋒軍因不滿調度而演發叛亂，最後仍需藉地

---

[80] 《永樂大典》卷 5343，頁 11 下；《元史》卷 129〈唆都傳〉，頁 3152。關於馬發的最後結局，李天鳴據《元史》卷 129〈百家奴傳〉，認爲他是爲元軍所殺，見《宋元戰史》，頁 1437；胡昭曦以爲馬發是戰死，見《宋元關係史》，頁 456；而汪廷奎據《永樂大典》卷 5343，認爲是自殺。本文暫從汪說。

方精英領導地方軍平定亂事，則說明這兩支軍隊的地方性格逐漸加強。

宋蒙戰爭爆發後，在蒙古軍強大壓力下，宋廷爲圖存，動員所有軍隊以抗蒙，東南三支地方軍無可避免地加入這場存亡絕續之戰。成爲調駐軍的飛虎軍首先被調入廣西參加抗禦蒙古的斡腹之謀，後來也回湖南抗蒙，它所發揮的戰力及其最後命運不詳，但大約因不服水土及戰爭中傷亡過重，此後已無法成軍。左翼軍則與蒲壽庚、田眞子等地方精英相互依存，結成利益共同體。當宋亡蒙興的情勢明朗時，在蒲壽庚等人的主導下，泉州地方勢力基於維護自身的利益，排拒流亡政府，殺害宗室、淮兵以及抗元士人，轉而投降蒙元王朝，爲新朝效命。摧鋒軍則在當地精英的領導下，於廣州、潮州等地，展開抗元的護土行動，成爲廣東地區抗元最激烈的地區，及最後支撐趙宋政權的一支武裝力量。

這三支地方軍的最後遭遇及抉擇，反映了中央權威與地方性格的消長，及地方勢力面對政局變動下的政治抉擇。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政權轉移、王朝更迭、國際戰爭中，都曾出現像這三支地方軍的不同遭遇，以及在世局變動下地方勢力的不同命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